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陈洪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301 - 05863 - 2

I. 德... II. 陈... III. ①高等教育 - 教育思想 - 研究 - 德国 - 古代 ②高等教育 - 教育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①G649.516
②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054 号

书 名: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陈洪捷 著

责任编辑:李 霞

标准书号:ISBN 7 - 301 - 05863 - 2/G · 076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08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修订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	(3)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及分析路径	(5)

上篇 德国古典大学观：从理想到现实

第二章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产生	(11)
第一节 18、19 世纪之交的德国大学	(12)
第二节 新大学观的萌芽	(14)
第三节 柏林大学的建立与新大学观的形成	(22)
第三章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经典文献	(27)
第一节 洪堡论大学	(28)
第二节 施莱尔马赫论大学	(35)
第三节 费希特论大学	(43)
第四章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概念	(49)
第一节 修养	(52)
第二节 科学	(57)
第三节 自由	(58)
第四节 寂寞	(60)
第五节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特点	(65)
第五章 古典大学观在 19 世纪的影响	(69)
第一节 修养	(69)
第二节 科学	(73)
第三节 自由	(77)
第四节 寂寞	(78)
第六章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独特性质	(83)
第一节 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理论	(86)

第二节 德国古典大学观为一种卡里斯玛观念	(88)
第三节 卡里斯玛与德国大学	(94)

下篇 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

——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

第七章 晚清中国对德国的认识教育及蔡元培的	
留德经历	(107)
第一节 德国：教育兴国的范例	(109)
第二节 蔡元培留学何以选择德国	(113)
第三节 蔡元培在德国	(116)
第八章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观的接受及其文化	
历史背景	(121)
第一节 蔡元培的大学思想与德国的大学观念	(122)
第二节 蔡元培的大学思想与中国的学术传统	(132)
第三节 卡里斯玛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	(145)
小结	(147)
第九章 蔡元培改革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149)
第一节 新大学观与学术转型	(150)
第二节 北京大学与新学术体制的形成	(156)
参考文献	(167)
附录一 德文内容摘要	(179)
附录二 利禄之徒与哲学之才	(194)
附录三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	
组织(节选)	(197)
附录四 寂寞和交际作为知识增长的条件	(202)
附录五 关于蔡元培在德国汉堡大学学习的考证	(206)
人名索引	(210)
主题词索引	(214)
再版后记	(215)

第一章 引论

1892年,一位法国学人在比较法德两国大学时说道:

德国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毫无例外地居于领先地位,各国对此均表承认。仅德国一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已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在科学中的优势堪与英国的贸易和海上优势相媲美,甚至更有超越之势。^①

我们不必完全听信这位法国学人,但从中至少看出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享有的声望。事实上,在19世纪的科学王国中,德国的确成果累累,地位显赫。根据对西方国家的统计,在1820—1919年中,40%的医学发明是由德国人完成的;1820—1914年,生理学中65%的有创见的论文出自德国人,德国人在1821—1900年中在物理学(热、光、电子和磁)方面的发明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②。按照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看法,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在世界科学界及其科学人才培养中占有绝对优势,堪称世界科学的中心。^③

德国之所以能在科学领域取得如此强大的优势,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则非大学莫属。在德国,科学事业基本完全以大学为依托,二者不可分离,正如德国著名教育史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20世纪初所说:

^① F.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德国大学及大学学习》). Berlin 1902, p. 210.

^② J. Ben-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Jersey 1971, pp. 188, 189, 192. 此书有中译本,〔以色列〕本-戴维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桂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此处所引内容在译本中被删。

^③ *Ibid.*, p. 15. 可参见此书中译本,第25页。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科学界所处的地位,主要归功于其大学。^①

回顾德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从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约100年是德国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述科学成就便是这一鼎盛时代的突出标志。同时,德国大学的成功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为现代大学教育提供了一种观念和组织上的新模式,从而推动了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美国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指出,19世纪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纪,而德国在其中起了带头作用。他说:

德国是第一个切实改变高等教育制度的欧洲国家,它为西欧、美国、日本以及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讲也为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种大学的模式。^②

组织制度上的优势和科学上的成就使得德国的大学备受推崇,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赴德留学。在1820—1920年中,仅美国在德国的留学生约9000人^③,英国赴德的留学生也不少于这一数字^④。德国大学的制度也受到不少西方、乃至东方国家,如日本、中国的羡慕和模仿。

鉴于其巨大的成就和广泛的国际影响,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历史、社会学及教育研究中颇受关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致力于描述和解释德国19世纪大学的发展过程。由于洪堡在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通常被视为德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因此,洪堡等其他改革倡导者的大学思想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就德国的研究文献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研究通常注重观念的层次,强调洪堡等人大学观对德国大学崛起的关键作用。6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

① F.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德国大学及大学学习》). Berlin 1902, p. 210.

② [美]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符娟明、陈树清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③ H. Röhrs, *Der Einfluß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Universitätsidee auf die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ka* (《德国古典大学观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Weiheim 1995, p. 11.

④ [英]阿什比著:《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转向大学的社会和制度层面^① ,同时对传统的注重观念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对传统大学观念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态度,创造了一种关于德国大学观念的神话,而没有顾及真正的历史事实。^② 总的看来,对于19世纪初洪堡在普鲁士所进行的大学改革,特别是改革时期所提出的大学观念在后来德国大学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属于传统型的观点倾向于把19世纪德国大学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洪堡及其合作者们所提出的大学思想,将德国大学后来的成就视为这种大学观念合乎逻辑的结果。另一种看法则注重德国大学发展中的社会和制度因素,认为洪堡等人大学观念的作用是及其有限的,甚至没有实际影响。如德国研究洪堡教育思想的权威学者门策(Clemens Menze)便指出:

由于政治、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原因,洪堡的大学观念在现实中无法付诸实施,未及落实于制度,便已告失败。^③

本-戴维也认为德国19世纪大学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大学体制和若干制度因素,而不是洪堡等人提出的大学思想,他说:

没有任何证据可把德国大学最后的科学生产率归因于改革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④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

针对现有的这些结论,本书首先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19世纪初所提出的德国大学观念对后来德国大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具体问题:

^① 参见 R. vom Bruch, Die deutsche Hochschule in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历史研究中的德国高等学校》), in: D. Goldschmidt et al.: Forschungsgegenstand Hochschule, Überblick und Trendbericht (《高等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概况与趋势》), Frankfurt/Main 1984, p. 9.

^② 关于所谓“洪堡神话”可参见 Mittelstraß, Die unzeitgemässe Universität (《不合时宜的大学》), Frankfurt/Main 1994, pp. 39—43; R. vom Bruch, Abschied vom Humboldt?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告别洪堡?”), in: K. Srobel,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im 20. Jahrhundert, Vierow bei Greifswald 1994, pp. 17—29.

^③ C. Menze, Die Bildungsreform Wilhelm von Humboldts (《威廉·封·洪堡的教育改革》), Hannover 1975, p. 429.

^④ J. Ben-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Jersey 1971, pp. 117—118, 参见中译本第227页。

第一个问题,何谓德国古典大学观?其内部构成如何?19世纪初,普鲁士在大败于拿破仑军队的背景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改革,而大学的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大学问题已是讨论了十余年的话题,改革势在必行,而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进行的。1809年,人文主义学者威廉·封·洪堡受命于普鲁士国王负责实施教育的改革。洪堡对已有的大学改革方案和建议进行了取舍,同时根据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即将建立的柏林大学提出了若干基本原则,并很快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建立。在柏林大学的示范性影响下,普鲁士及整个德国的大学先后都相应进行了改革。柏林大学所遵循的思想和原则随之为德国大学所普遍接受。本文中,将柏林大学筹建时期所提出的、建立在理想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之上的大学观念称之为德国古典大学观。它是19世纪后半期实际支配德国大学观念的基础,但与之又不尽相同。提出古典大学观的文人学者虽然对大学抱有大致相同的理想,但对许多具体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因此,德国古典大学观首先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内容需要进一步加以界定和说明,以揭示其特征和基本价值指向。

第二个问题,德国古典大学观对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影响如何?影响方式有何特点?这里主要考察的问题是,古典大学观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了德国的大学及大学教师的行为?这里探讨的是古典大学观实际被接受的情况,或者说是支配德国大学的信念系统。所讨论的重点不是古典大学观的具体内容,而是将它视为一种信念的模式,就是说,重点考察古典大学观的内在价值取向对德国大学的影响。这里将主要以观念本身为分析对象,只是在必要时才涉及制度因素。

本书的第二项研究内容是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这既是对德国古典大学观所产生的国际影响的一项分析,也是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外来影响的个案研究。本文将以蔡元培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探讨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这里也包括两个问题:

一、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德国大学观念的关系,重点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蔡元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德国的大学观念,或者说,他的大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追溯到德国的大学观

念?并通过这一案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大学观在中国的影响。

二、蔡元培借鉴德国大学观念的文化历史背景。这里将从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传统中寻求有利于接受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因素,以探讨在文化或观念的移植过程中外来观念与本土文化的微妙关系。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及分析路径

如前所述,不少西方乃至东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得益于德国大学的经验。因此,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都可追溯到德国19世纪的大学,研究德国19世纪的大学,特别是其大学观念对于理解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德国大学的模式是以其特有的大学观念为基础的,研究这些观念对于深入了解德国大学至为重要。而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对19世纪德国大学及其观念的研究还相当有限^①。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德国古典大学观虽已有大量的研究,但仍有不少有待研究和有争议的问题,如德国古典大学观念的影响问题。

关于德国古典大学观念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的有关研究中,尚极少被涉及。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研究中,蔡元培受到与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这一说法虽早已是定论,但迄今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②。本研究期望对蔡元培研究、中德文化教育交流研究以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外来影响的

^① 发表的有关的论文几乎屈指可数,具体有:李其龙“洪堡改革高等教育的思想与实践”,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胡劲松“论德国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硕士论文;刘传德“试评洪堡的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影响”,载《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3期;曾宁波“试论洪堡的高等教育思想”,载《外国教育动态》1991年第6期;曾宁波“试论费希特的高等教育思想”,载《比较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贺国庆的“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另外,还有王佩莉的博士论文“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Cai Yuanpei;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zweier klassischer Bildungskonzepte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und in der ersten chinesischen Republik”(《威廉·封·洪堡和蔡元培——德国启蒙主义时期和中华民国初年两种经典教育理论的比较》),Münster 1996,但该文很少涉及高等教育。

^② 笔者曾对蔡元培的大学思想与德国的大学观念进行过初步分析,见《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与德国的大学观》,载《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第24—29页。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在《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一文中提到蔡元培的大学观念受到德国的影响,见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5—82页。

研究诸方面有所裨益,并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大学观进行爬梳,理清其基本的观点,重点分析其核心的概念及其时代背景,力争全面挖掘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内涵和及其价值取向。

其次,将运用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理论解释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性质和作用方式,以揭示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独特性质。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为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的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本研究是运用卡里斯玛理论用以解释思想观念现象的一次理论尝试,希望能从一新的角度拓宽卡里斯玛理论的解释范围。

再次,在系统比较的基础上,说明蔡元培的大学思想与德国古典大学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明德国古典大学观对蔡元培大学思想的影响程度。

最后,将通过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借鉴,来探讨移植外来价值和观念过程中的文化历史条件,希望由此能加深对文化移植中外来和本土观念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而非观念。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像扳道工规定着利益驱动行为前进的轨道。”^①这句话形象地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对人的行为具有较大的规范力量。韦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化观念与人的行为及社会组织的关系,特别是观念的社会实际后果,如新教伦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韦伯曾强调说,他的研究旨在“为揭示‘观念’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方式”作些贡献。^②

本书的中心问题实际上也是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及其方式,具体说是德国古典大学观对19世纪德国大学及其教授们的影响及其方式。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是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或者说价值系统之上的,价值观念对其行为有着特殊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克拉克(Burton R. Clark)指出:“学术系统在象征方面是富有

^①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Tübingen (1920) 1988, p. 252.

^② Ibid., p. 82.

的”^①。但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往往受到重视,而文化和价值这一层面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德国大学的研究,也存在此种倾向。根据上引本-戴维观点,德国大学信念系统的源泉被简单地否定了,这种结论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当然,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常常是复杂、微妙和难以把握的,或者说给人以虚的感觉,不如制度性因素来得实在和明确,但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本书的分析将循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分析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内容及其对后来大学的影响。鉴于有关德国古典大学观的重要文献迄今基本没有汉语译本^②,首先将用较多篇幅对若干经典人物及文献进行评介。评介同时也是理解和整理的过程;由于表述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原始文献数量较多,而且旨趣也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抵牾之处,所以必须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内容进行选择 and 界定。这里将参照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的方法从文献中提取出若干共同的核心观念用以刻画德国古典大学观。所谓“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学中的基本方法,它通过“通过单方面强调”事物的某些特征^③,而建构出理想化的典型;它提供了一种手段,藉此可以更清晰地把握纷纭的社会历史现象。关于理想类型的方法,韦伯本人的论述虽多有含混之处,引起不少争议,但它一般仍被视为社会科学中一种有用而必要的分析手段。^④

第二,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影响及其方式,这里将主要分析德国大学观的卡里斯玛性质,以说明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独特性质和特殊的影响力度,及其在德国大学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第三,在分析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时,首先仍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将德国古典大学观与蔡元培的大学思想进行比较,

^① [美]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② 笔者曾试译洪堡的“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见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1987年第1期。

^③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科学理论论文集》), Tübingen (1922)1988, pp. 190—191.

^④ D. Käsler,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Max Webers* (《马克思·韦伯导读》), München 1979, pp. 182—183.

以确定德国大学观念对蔡元培影响的程度。然后从中国学术传统和时代学术变化的角度探讨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们接受德国大学观念的内在可能性,从而说明蔡元培接受德国大学观念的文化和历史条件,及其外来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之间的关系。

上 篇

德国古典大学观：
从理想到现实

第二章 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产生

德国的大学也像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是中世纪的产物。但与欧洲早期的大学如波伦尼亚、巴黎或牛津大学相比,德国大学产生得较晚。当大学在欧洲南部和西部已存在了至少两个世纪之后,德国才开始拥有自己的大学。建于1348年的布拉格(Prag)大学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内的第一所大学。而此时意大利已拥有15所大学,法国8所,西班牙6所,英国2所。继布拉格大学之后,在德国相继又出现了维也纳(Wien,1384)、海德堡(Heidelberg,1385)、科隆(Köln,1388)、爱尔福特(Erfurt,1392)和莱比锡(Leipzig,1409)等五所大学。这是德国的第一批大学。15世纪后半叶,在人文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在德国又增加了一批大学,包括弗莱堡大学(Freiburg,1456)、图宾根大学(Tübingen,1477)等。宗教改革之后,在新旧教派纷争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三批大学。到18世纪末,德国已拥有42所大学,在欧洲诸国中名列第一。^①

德国的大学与早期欧洲自然形成的大学不同,它一开始便是由诸侯或城市当局有意识建立的。雄心勃勃的地方诸侯们往往从政治统治和控制臣民思想意识,甚至实力炫耀的需要出发,建立起自己的大学。加之德国中央权力薄弱、地方势力雄厚,这使得德国大学在数量上发展较快。但在18世纪以前,德国大学基本是追随意大利或法国的大学,亦步亦趋,没有突出的建树。

在17、18世纪,德国大学随整个欧洲大学陷入危机之中。无

^① 关于德国大学史的文献较多,兹举数例: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从中世纪到当代》)(Berlin 1919/1921)堪称经典之作,较新的大学史著作有H.-W. Prahl, *Sozialgeschichte des Hochschulwesens* (《高等教育社会史》)(München 1978),T. Ellwein,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大学:从中世纪到当代》)(Frankfurt/Main 1985,1992),R. A. Mülle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istas zur deutschen Hochschule* (《大学史:从中世纪的大学到德意志高等学校》)(München 1990)。

论在政治、社会中,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大学均处于边沿地位,没有重要的贡献。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危机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哈勒、格廷根大学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下脱颖而出,为德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

第一节 18、19 世纪之交的德国大学

18 世纪的德国是新旧交织、由等级社会向市民社会和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启蒙运动和开明君主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观念的变革。新兴的君主制邦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出于建立统一的国家及其行政、司法及财政管理制度的需要,出于加强对臣民思想控制的需要,不断将大学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大学失去了许多传统的自治权利,国家的权限深入到教学、人事、财政等各个方面,大学成为依附于政府的教育机构;为国家培养具备各种实用知识的官吏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被称为培养“国家臣仆的学校”。^①

与此同时,大学也开始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寻求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途径。学术与课程逐渐接近社会实际,注重实用性,所谓政商学^②或包括跳舞、骑术、击剑术在内的“贵族诸科”(Kavaliersfächer)便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培养的目标从不闻世事的书斋型的学者转向善于官场应酬的绅士,教授学生也一改修士般形象,在生活和服装等方面追求宫廷所代表的时尚。启蒙主义大学的代表是哈勒(Halle)大学和格廷根(Göttingen)大学,它们在满足国家社会需求的同时,更从理性原则出发,排除宗教偏见的束缚,开了学术自由的先河,为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从总体上看,德国的大学在启蒙的世纪中仍处于自 17 世纪以来的衰落之中。教授缺乏尊严和地位,学生更以其败坏的生活

^① T. Ellwein,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大学:从中世纪到当代》), Frankfurt/Main 1992, p. 47.

^② Kameralistik, 是当时特有的一门包含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及其他内政管理内容的学科,是当时专制君主制度的产物。最初的政商学讲座于 1727 年设于哈勒大学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到 18 世纪末时,德国大学共设政商学讲座 23 个。进入 19 世纪后,政商学作为学科在德国大学中逐渐消失。参见 R. A. Mülle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itas zur deutschen Hochschule (《大学史:从中世纪的大学到德意志高等学校》), München 1990, p. 61.

风格而遭世人的诟病。

教授们还普遍处于中世纪残留的学术传统中,其任务还仅仅在于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发现新的知识。教授们轮流讲授本学院的所有课程,如康德授课的内容非常广泛,从自然科学、数学到形而上学、逻辑学等。教学的主要形式仍然为宣讲(lectio),即按规定的教材照本宣科并进行解释、评论和论辩(disputatio),即运用所学的知识对某一题目进行公开的辩论,但实际上只是从原则到原则的教条式辩论。教授为了弥补其微薄的收入,往往在大学外兼任其他职位,或在要求的课程之外增开课程。当时课程分公共课和私人课两种,^①公共课即教授职位所规定开设的课程,对学生是免费的,而私人课是教授在公共课之外所开设的课程,学生交费听课。多开私人课成为教授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教授的选拔和聘任中,裙带之风和门户之见十分严重,亲戚、朋友关系常常比学术水平更为重要。

大部分学生的年龄在16—22岁之间,一般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只是具备一些拉丁文基础,想通过读大学增加一些文化知识,往往缺乏对学术的追求。普鲁士于1788年才首次把人文学堂(Gymnasium)的毕业证书规定为入大学的先决条件。更多的学生只是为大学的生活所吸引而入大学的。作为大学生可以不受本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过一种随意的、不受监督的和没有谋生压力的生活。不少学生无所事事,终日玩乐。一位18世纪末的大学生在后来回忆其在基尔(Kiel)大学学习生活时写到:相当一批学生为懒学生,

他们时不时地也带着书包也去听听课,以便不被开除;但在学习上也就仅此而已,更多的一概不为。露天酒肆……是他们夏天的去处,冬天他们则在咖啡馆中度日,只有上床睡觉能让他们离开这里。他们在此都干些什么?各种各样,玩九柱戏,打扑克,打台球,喝啤酒,喝白酒,或者并排坐着抽烟斗。^②

^① 从16世纪中开始,德国大学的教授允许在规定的公共课(publica)之外开设私人课(privatim),即收费授课,此类课程最初仅为复习或辅导性质,但逐渐扩展到开设新课,讲授规定课程以外的内容。由于这种课程的内容往往由教师和学生商定,因而颇受学生欢迎,其分量从17世纪起不断加强。

^② T. Ellwein,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大学:从中世纪到当代》), Frankfurt/Main 1992, p. 101.

持剑决斗、斗殴、侵扰市民也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方面,直到19世纪初,有关大学生惹是生非、制造事端的记载仍不绝于史。在18世纪,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独立司法权,学生不受所在地法律约束,这是大学生屡生事端的重要原因。因此,19世纪初的大学改革者们大都主张取消大学的司法权,如英格尔说:“大学的独立司法权带来了不少的灾祸,应当取消”。^①

总之,到18世纪末时,大学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出现了关于大学改革的大讨论,根据较为激进的观点,大学作为中世纪的产物已落后于时代,应由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取而代之。大学的危机还反映在大学数量的急剧收缩,18世纪末时,德国大学生总数仅为6000—7000人,降到两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②,在18、19世纪之交的二十余年中,德国大学有一半关门停办。

第二节 新大学观的萌芽

18世纪中叶以后,启蒙运动在德国达到了全盛时期,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一种强大的革新力量。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如康德所说,是“拿出勇气,运用你的理性!”^③理性遂成为一种武器和催化剂,传统的观念和宗教的教条开始受到怀疑和批评。在此背景下,关于大学的新观念逐渐形成。学术自由作为德国古典大学观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即可溯源于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第一位启蒙主义代表人物、哲学家沃尔夫^④便对神学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主张哲学以理性为基础,应自由探索真理,而不应受到神学的束缚。启蒙运动的另一项基本要求是宗教宽容,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在17世纪,基督教各教派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启蒙主义者从理性

^① E. Müller (Ed.), *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 von J. J. Engel, Erhard, Wolf, Fichte, Schleiermacher, v. Humboldt, Hegel* (《大学随想录:英格尔、艾哈德、沃尔夫、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黑格尔》), Leipzig 1990, p. 14.

^② R. A. Mülle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istas zur deutschen Hochschule* (《大学史:从中世纪的大学到德意志高等学校》), München 1990, p. 60.

^③ I. Kant, *Was ist Aufklärung?* In: E. Bahr, *Was ist Aufkl' rung?* (《什么的启蒙》), Stuttgart 1784, p. 9.

^④ Christian Wolf (1679—1754), 哲学家,18世纪康德之前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以其沃尔夫哲学体系而闻名,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tz)的学生,在马堡(Marburg)和哈勒大学任数学和哲学教授。

的原则出发,主张各教派均有存在的权利,都应放弃僵硬的教条,停止宗教迫害,其实质仍是主张思想自由。18世纪德国两所最出色的大学,哈勒大学和格廷根大学便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预示了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

一、哈勒大学、格廷根大学与新的大学观念

哈勒大学建于1694年,被称为“第一所现代大学”,^①大学的两位精神领袖法学家托马斯^②和神学家弗兰克^③均是因为批评正统、作为“革命分子”^④被迫离开莱比锡大学的。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哈勒大学成为抨击正统神学的教条,主张思想自由的阵地。康德之前德国的启蒙哲学领袖沃尔夫就是在这块阵地上赢得其声誉的。1711年,哈勒大学的法学教授贡德令(N. Gundling)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称哈勒大学为“自由的殿堂”(Atrium libertatis),说大学的任务在于教人如何获得智慧,如何辨别真伪,其活动不应有任何前提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权以强迫的方式使他人接受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学说和著述的自由是所有精神力量得以发展,所有科学得以繁荣的根本保证^⑤。但后来由于弗兰克所代表的虔敬派^⑥不能容忍异己而导致哈勒大学的衰微。

继哈勒大学后,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成为又一所标举思

① 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从中世纪到当代》), Berlin 1919/1921, vol. I, p. 535.

② 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 哲学家、法学家,因反对正统神学而被莱比锡大学驱逐,对哈勒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德国用德语(而非拉丁语)授课的第一人。

③ August Herrmann Francke (1663—1727), 神学家、教育家,虔敬派领袖之一,以创办教育学社(Pädagogium)闻名,内设贫民学校、孤儿院、医疗所等;与托马斯一起奠定了哈勒大学的地位。

④ 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zur Gegenwart* (《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从中世纪到当代》), Berlin 1919/1921, vol. I, p. 536.

⑤ Ibid., p. 543.

⑥ Pietismus, 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盛行于17、18世纪,反对迂腐的经院神学,指责当时的宗教生活流于空洞的形式,注重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效果,主张摆脱宗教教条,强调宗教应诉诸个人的内心和情感。虔敬派在当时对促进理性观念有积极意义,对德国18世纪的思想观念有重要影响。参见 W. Hubatsch, *Deutschland zwischen dem 30-jährigen Krieg und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德国》), 1976, p. 136.